

1949,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

文\钟 一

历史上的海南，建省改特已经很难，而一旦决定改特筹省，由谁出长海南同样非常难产。1949年发生的这吊诡的一幕幕，台面上的人物是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陈济棠及琼籍名流韩汉英、郑介民、黄珍吾、陈策、王俊等，而背后的实质人物是蒋介石与桂系首要李宗仁。

实际上,随着1月21日的蒋退李代,蒋介石与桂系的斗争,始终是1949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的重头戏。这时仍然是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海南历史,便与蒋桂或蒋李斗争一起跌宕起伏。海南成为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时代,蒋桂角力的重要地盘。海南特区长官之争,只是当中的一幕。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1949年53岁的陈诚出长台湾,实际是蒋介石谋求撤出大陆、经营台湾的最重要的人事布局。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海口解放。图为被我军占领的《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资料照片)

1. 陈诚主台

1949年1月1日,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元旦文告,以作引退的试探。至1月21日,始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及至翌年3月1日,蒋介石始复职。

蒋介石在1月21日下野之前,已经做好放弃大陆、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还计划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体现在人事部署中,不但以陈诚出长台湾,任台湾省主席;还让张发奎出长海南,任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此项任命,就与来自陈诚的建议相关。

陈诚,别号辞修,浙江省青田人,与蒋介石是同乡。抗战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至1947年8月陈诚兼任东北行轅主任及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但是,正是陈诚将东北搞成了国民党的败亡之地,不可收拾。当时国民党内群起呼声,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旅居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更是“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李宗仁回忆录》)

对陈诚而言,1948年6月5日,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日”。据他的回忆,这一天他决定进上海陆军医院动手术,把多年来的胃溃疡病完全割治好了。在痼疾清除之后,尚须有一较长时间的静养,始能康复。他婉言拒绝了许多亲友劝其出国的建议,决定举家迁台,以作暂安之计。“因为台湾一方面气候较宜于养病,一方面交通亦较便利,而且环境幽静,物价亦比较便宜,于是商得内人同意之后,遂于十月六日偕眷搭班机飞台,暂借草山的海军招待所为栖身之所。”

陈诚选择举家迁台,从他的回忆看,是纯粹的到台湾养病,但很快在12月24日他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因此后人更多是从政治上解读他的台湾养病之说。这也就是李宗仁回忆录中所记,陈诚于1948年初春自东北铍羽归来之后,面对此局面,“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病,实另有所布置。”

1949年1月5日上午,台湾省政府在台北举行新旧任主席交接典礼,陈诚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北就职视事,揭橥今后治台的最高原则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值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土崩瓦解之际,五十三岁的陈诚出长台湾,实际是蒋介石谋求撤出大陆、经营台湾的最重要的人事布局。陈诚主台事件的背后,可以窥视国民党各种势力在海南的角力,及其轮番表现。而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盟友,陈诚在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1949年的海南历史风云,一开始就与年初陈诚主台相关,其高潮则是这年10月30日他奉蒋介石之命,以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为名,硬是拆散了

桂系经营的“两广合作”,让桂系的一番苦心,化作一缕历史烟云。

2. 筹计海南

就上任的这天(1月5日),陈诚通过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密呈蒋介石,提出五项建议,请以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与海南岛在军事上有互为犄角之势,在生产上则台湾有许多工业原料仰赖于海南,应速设立军事机构,肃清潜匪。陈主席诚瞩职代面呈,请以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而以欧震副之,并另拨一军之番号责成欧震将该岛地方团队加以整编充实,必能完成其使命也。”

又说:“台湾、浙、闽、广东与海南岛,以台湾为核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再受到挫折,尚有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情势之演变,而恢复本党之基业也。”

蒋介石1月7日致电陈诚,其中涉及到广东重要的人事部署是:“可否约向华(张发奎)来商谈时局与利害,使其不为反动派利用。”“广州绥靖主任拟派幄奇(余汉谋)继任,而以伯陵(薛岳)任陆军总司令,并囑电伯陵来台面商,但不预先明言其任务”。这里已隐然可见蒋介石分化桂系的用心。

陈诚于1月8日拟了一个长电呈复蒋介石,响应蒋提出的约张发奎来商谈时局与利害,使其不为反动派利用的指示,而提出让张主持海南大局的建议。

电文中说:“向华(张发奎)兄遵即电约来台商谈,惟海南岛关系至钜,不早筹计,将入敌手,最好即以向华兄前往主持,而以欧震襄助,专管军事,给以一个军之番号,由保安队拨编充实之。”又说:“伯陵(薛岳)兄前曾电约率诸孩来台,以种种不便未果,当再电相邀。渠愤慨虽多,但绝不至为反动者所利用。陆总恐非所愿,如以广州绥署或以韶关另设绥署,令其负责,必能深资倚畀。”

关于约张发奎、薛岳来台事,据陈诚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都没有来。总统(蒋介石)同时亦曾去电相召,以道远言略,亦均无结果。后来总统要我先得伯陵(薛岳)同意后,发表他继宋子文先生之后为粤省主席。另发表张向华为陆军总司令,而以余幄奇(汉谋)任广州绥署主任,以陈伯南(济棠)任海南军政长官。”可见,广东的这些人事变动,蒋介石都是假手陈诚来进行的。

3. 第二方案

现在常见一些报刊转载“三种方案”的说法,说是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制订了三种方案的,其中第二方案就是以海南岛为最后退路的。

叶永烈在《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这样描述:蒋介石在危败之际,原本制订了三种方案:一是以四川为中心,西南为根据地,走当年抗战的老路,与毛泽东长久对抗。二是以

海南岛为最后退路。三是以台湾为最后退路。如果这三种方案都失败,则退到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重庆、成都、西昌的接连失守,使蒋介石的第一方案宣告破产。就在打下西昌之后,半个多月——(1950)四月十六日傍晚六时半,几百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出发,朝南驶去。薛岳知道海南岛难保,曾面见蒋介石,请求从海南岛主动撤退,遭到蒋的拒绝。蒋介石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海南全境已是解放军的天下。于是,蒋介石第二方案又告破产。这样,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他的第三方案——以台湾为最后退路。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楚河汉界”,继续对立着。

按照这种说法,则蒋介石是在海南岛获得解放之后,也就是在他的第二方案宣告破产的情况下,改为实行以台湾为最后退路的第三方案的。实际是,这种类似于沙盘推演式的结论,似是而非,在逻辑推理上和历史事实上都不成立。仅仅就文中蒋拒绝薛岳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就难以取信。海南战役对于蒋介石而言,正是主动“撤出海南”、“弃守海南”的。为此,蒋介石于1950年5月16日还发布了所谓的《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蒋经国也一度为“撤退海南”辩护。

更何况,“三种方案”的说法,完全看不到在下野之前,蒋介石已经做好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包括人们已熟知的黄金运台,也完全看不到1949年海南是蒋桂这国民党内两大势力较力的重要场所,蒋氏心腹陈诚筹计海南,桂系大将白崇禧更是以海南为退路,甚至一度还做好将国民政府迁到海南的准备。

历史真的不是历史学家的沙盘推演。

4. 向华辞任张发奎

陈诚给蒋介石的建议,请张发奎前往海南主持军事,到头来,蒋介石是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月18日,即蒋介石在下野的前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警备总司令;1月19日,再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1月20日任刘攻芸为中央银行总裁。

部署既毕,蒋介石才于1月21日10时许发表引退文告,宣布“身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当日下午,蒋飞杭州转奉化。

据陈诚回忆:“总统引退之日,除任命汤恩伯现职外,并明令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立法院于1948年8月15日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介石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其法理根据就是据此。

2月1日,粤、穗各界欢迎、欢送余汉谋、薛岳、张发奎三位将军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到会2000余人。余、薛联合致答词。但是,张发奎却因不愿去海南就职,另致答词。

张发奎为什么不愿去海南就职呢?目前为止能看到的说法是,张发奎因提出“有兵”、“有粮”、“有权”等一系列先决条件未获解决,以“在此局势下,事未易为”为由,辞而不就海南行政长官。

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解放后在其《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中回忆说:“1948年,蒋介石在沈阳、锦州、天津等战役迭遭惨败后,冀以海南为基地,重整旗鼓,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8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为了加强他对华南后方基地的控制,假手广东军阀以控制广东,在1月21日,分别发表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岛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代替猬集华南专政大权于一身的宋子文。”

(下转 C6版)